

邓小平的桥牌情缘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，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。从此，邓小平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。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，守得紧、攻得狠、叫得准、打得稳，风度翩翩，一派大将风度。



打桥牌是邓小平的一大爱好。

□王 桢

“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”

到了晚年，邓小平把打桥牌当成自己向智力、体力挑战的一种手段。1986年8月5日，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。他在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说：“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。一条是能不能下海，一条是能不能打桥牌。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，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。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，股票就下跌。其实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。只要知道我在打桥牌，夏天还在游泳就行。”三言两语，邓小平用诙谐的语言化解了社会上对他健康状况的谣言，也道出了他打桥牌的原因。

作为总设计师，邓小平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，即便休息，他的头脑仍在不停地思考问题。细心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发现，邓小平在最平常的散步中也仍在为工作开动脑筋。夫人卓琳非常担心他的健康，在反复琢磨后，卓琳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她专门同常和邓小平打牌的同志谈了一次话，告诉他们：“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，因为他看电影、看书时都不免想到工作。”得知此事后，他们一方面感叹邓小平鞠躬尽瘁的精神，另一方面表示尽量找时间陪他打牌，让他得到休息。在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的牌局中，邓小平才有机会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务中暂时摆脱出来，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。

邓小平坚持桥牌运动一直到生命的

最后岁月。受帕金森症的影响，他的手因颤抖拿不稳扑克牌，抽牌也显得很吃力。这个时候，邓小平的女儿就主动帮忙拿牌、将牌。当然，在牌局上打什么牌还是由邓小平做主，比如“要”一个草花，女儿“要”好了就向邓小平重复一声，再继续进行。真可谓生命不息、运动不止！

“打牌要和高手打，输了也有味道”

桥牌，是一项能够反映参与者品格、性格的竞技比赛。在巧妙多变的牌局中，邓小平的个性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现。

不服输。当牌面情况不明朗或有问题时，邓小平会细心地推敲，寻找牌理。遇到有争议的牌局时，他总要弄出个究竟。有一次，邓小平同女儿邓楠打牌，邓楠在牌局结束收牌时对父亲说：“刚才您那张牌不该那么出。”邓小平当时想了想，没有说话。第二天打牌，大家刚刚入座，邓小平就复盘了第一天的牌局问：“你们说，谁对，谁错？”大家随即进入了牌局的深入推敲环节。发现难题之后积极思考得出结论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邓楠回忆说：“关于出哪张牌的问题，我们经常发生争论，很有意思。”

拒绝“踢假球”。围棋国手聂卫平经常被邀请同邓小平打桥牌，也亲历了许多与邓小平打桥牌的趣事。他曾说：“邓

小平的桥牌水平是很高的，比我的牌技要好得多。做他的对手想赢他，实在是很困难。”有一次，聂卫平和邓小平搭档，在他们猛烈的攻势下，对手万里和祝寿和输得特别惨。见状，聂卫平觉得不忍心，就故意“放水”让对手得一些分数，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“踢假球”。聂卫平瞥见万里手中黑桃很多，而自己只有四张黑桃，就故意叫黑桃。万里果然加倍，这样就宕了6个，6个宕使对手得分翻番很多。邓小平当时指着聂卫平笑称：“他创了世界纪录了。”后来，邓小平碰巧见到聂卫平的爱人，他风趣地说：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，桥牌可不是九段。

正因为打桥牌技艺高超、讲究规矩，邓小平结识了许多中外桥牌高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打牌要和高手打，输了也有味道”。1981年，“桥牌女皇”、美籍华人杨小燕曾到北京与邓小平、万里等打桥牌。在那次切磋中，他们从晚上八点一直打到深夜一点，连续对阵四五个小时。邓小平全情投入，不但毫无倦意，直至局终仍然神采奕奕。在牌局中，杨小燕发现邓小平对“精确叫牌制”非常熟悉，可见邓小平对世界桥牌的主流“技、战、术”很有研究。邓小平的牌风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她说：“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，牌风稳健，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，这在80岁的老人中，是十分令人吃惊的。邓小平的牌技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，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。”

邓小平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，这一点，他的牌友们很有体会。邓小平不但打牌不谈政治，打完桥牌和友人一起吃饭时也不谈政治。也正因为不谈政治的原则，大家都感觉同邓小平打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没有多余的压力。一张四方的牌桌，一群热爱桥牌运动的人聚在一起，互相专注牌局的变化，在酣斗中传出阵阵欢乐的笑声，其乐融融。

“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，我们感到非常骄傲”

桥牌是国际比赛项目，世界上不少政要都喜欢打桥牌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参成的情况下，没有放弃打桥牌的爱好；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登陆北非消息期间，也不忘挤出时间打上几局桥牌。邓小平也是

桥牌爱好者，因其对中国桥牌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得到了来自世界范围的好评和赞扬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。这导致了桥牌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度很低，更不用说有多少“国手”了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百废待兴。针对桥牌事业发展停滞的问题，1978年7月，在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骥、袁宗沪和郑雪莱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提出了在我国推广和发展桥牌运动的建议。几位桥牌专家很快得到了消息，邓小平对此信作出了批示：“请团委考虑”。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关注下，中国的桥牌运动重新开展起来。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，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。

从1984年开始，为了推广桥牌运动，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了“运筹与健康”老同志桥牌赛。邓小平亲自率队参加比赛，比赛共办了10届，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结束，邓小平的队伍基本上每届都是冠军，仅有一次拿了第二名。1991年10月，中国女子桥牌队在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。女队回国后，邓小平为鼓励她们，亲切地接见并邀请女队员打了一场友谊赛。在这场比赛中，邓小平“叫”“打”俱佳，战胜了中国队。在惊叹邓小平牌技的同时，女运动员们表示一定要刻苦钻研牌技，力争为祖国取得更好成绩。

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，可以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。随着中国桥牌协会的成立，中国桥牌事业逐步走上正轨，开始成为世界桥牌界不可小觑的一支新生力量。邓小平对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，1981年12月，国际桥牌新闻协会将最高荣誉“戈伦奖”授予了邓小平。1988年7月，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。1993年6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·沃尔夫和北美桥牌联合会秘书长杨小燕，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“主席最高荣誉”奖，以感谢他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开展所作的重要贡献。

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，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·达米亚尼在悼念邓小平的电文中说：“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，我们感到非常骄傲。”

党史人物

三条，才能保得住一个‘公’字”。彭德怀说的这三条，人称“保公三诀”。就是通过这样简单质朴的语言，彭德怀将慎独慎微的纪律要求具体化，时刻提醒身边人要对小恩小惠保持高度警惕。

明者慎独，智者慎微。面对小恩小惠，习仲勋是个明智者。当年，习仲勋在洛阳期间，齐桥桥带着习远平去探望父亲。一天，他们到工厂小卖部去买苹果，售货员知道他们是习仲勋的子女，出于对习仲勋的敬重之心，专门挑了大个的给孩子们，回家后姐弟俩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。但习仲勋却严肃地批评了他们，还硬是让孩子们把大个的苹果退了回去。后来，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期间，一次一批知名画家到广州采风作画。向来尊重文化界人士和艺术家的习仲勋，本打算亲自看望画家们，但因为公务繁忙，实在抽不出时间，于是，便安排齐桥桥等人代表他去看望画家。为了避免孩子们向画家要画，或者被送画，孩子们出发前，习仲勋一再强调，画家们很辛苦，画一幅画不容易，此去的目的只有慰问，别无其他。

不因小优小待而失原则。对于领导干部而言，如何把“官优”作风拒之家门之外？如何将待遇锁定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中，不让家人“沾光”？就是要坚守原则。坚于隐，守于微，真正举起慎独慎微这把纪律戒尺。

1958年，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，毛泽东说：“聂荣臻是个厚道人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他的女儿聂力深有体会。她说，父亲的厚道表现在很多方面，其中之一便是严于律己、严于律家，他甚至为了避嫌而“苛待”自己最亲爱的人。聂荣臻对家人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，他不准妻子张瑞华和聂力随便使用公家的车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张瑞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，每天一大早，她都是自己赶公共汽车去上班，还自己带饭。有一次乘车时，由于太拥挤，张瑞华被挤下车摔在了马路边，额头肿了一个包，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

党建是一件关系中心、关乎全局的基础性工作。民心惟本，厥作惟叶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，也是最大的党建。党的工作覆盖是否有效，党建优势体现是否充分，就看民心所向如何。必须把集聚民心作为党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在如履薄冰、兢兢业业中善作善成，在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中强基固本。

党建集聚民心，要有“温度”还要提“质感”。党建不是虚的，而是实的。党建工作本质上就是将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由虚转实的过程，并成为一种自上而下共同的信仰追求。因此，党建红旗不仅要扛起来，更要插到基层群众的心坎上，覆盖到更多党建空白点和薄弱点上。有效覆盖也不应是冷冰冰的数字，而应指向每一处缺乏党建温度的角落，具体到为党员群众解决教育、医疗、就业等日常生活的实事上，不仅要去做，还要看做什么、怎么做、做成了什么，有没有创造更多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惠，让党建红旗不仅仅是无形的力量，更实实在

在的“质感”。

党建集聚民心，要“涉险滩”还要“下深水”。党建不能“无为”，而要主动作为。当前，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，但一些党建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存在，涉及体制机制改革的硬骨头还有不少，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也正逐渐冒头。更好发挥党建优势，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，一个险滩一个险滩摸过去，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攻到位，真正做到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，事不做成不罢休；就是要敢于下到深处，以更近的视角、更准的站位“把脉问诊”，以刀刀向肉、自我革命的精神“猛药去疴”，让群众在勇气和变化面前看到新气象、新作为。

党建集聚民心，要听“乡语”还要辨“真音”。党建不是“独角戏”，而是“协奏曲”。不能回应基层的愿景，党建取向就成了“谜”；没有“乡语口碑”的点赞，党建成效就存有问号。党建工作怎么开展、开展得怎么样，不能自拉自唱、自我陶醉，而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。就是要把群众呼声作为工作导向、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尺，让党建在不负众望中得到认可、支持与赞誉。同时，要注重运用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多种手段，更加广泛深入地听取真意见、辨析真声音，找准精准勾连民情民意

的“关键锁”，让党建工作始终在学画和谐同心圆的轨道上运行。

民心也是最大的党建

□何亚兵

党建视角

慎独慎微固根本

□聂文婷

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。做到慎独慎微，方能显人格，树家风。在这方面，老一辈无产阶级

慎独慎微，乃固本之方，是一份润物细无声的家风涵养。坚持

汽车。她对聂力说：“你爸爸的车，不该我们坐。我们坐上了，心里也不踏实。”唯有慎独慎微，方能君子坦荡荡。因为父亲的严格要求，还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，虽然是聂荣臻唯一的女儿，聂力也能非常理智地拒绝“官优”待遇她总是自己骑车去上学，即使天气不好，她也坚决不坐父亲的车她说：“爸爸说过多次，不让我坐他的车。再说，同学看见影响不好。”

据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回忆，父亲总是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小事情教育他们：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、身份变了，就不断加重额外的照顾。1947年7月，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，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。在罗荣桓看来，住这样的房子太扎眼，也不符合他一直以来低调的行事风格。于是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，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。一次，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，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，就跟他说：“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？你家住楼上，我们住楼下。欢迎吗？”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在句玩笑话，但没想到，过了两天，罗荣桓一家就真的搬来住了。罗荣桓对家人说：“住的房子大小，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，但我们是党的干部，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，不能官越做越大，住的楼越来越高。”

总之，慎独慎微，是广大党员道德修养的根本准则，是党员干部修身律己的时代要求，更是领导干部家风塑造的基本内容。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常修从政之德，常怀律己之心，慎独处，慎微事，将他律变为自律，变外在规则为内在自觉，才能无愧于百姓的期盼，无愧于党和国家的重托。

参考与建议